

喻向午



光阴荏苒,倏而2020年已过半。在这刚刚过去的上半年里,世界与中国共同经历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面向的巨大变化。正如王国维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文学与我们的时代脉搏共振,而文学理论评论刊物则是记录文学创作、批评与研究在新时代出现的新现象、新方法的重要载体。通过细读2020年上半年的文学理论评论刊物可以发现,立足“此刻”与“当下”,把握历史与未来,是这些刊物发表的研究文章的核心精神。而其学术动向则主要表现在聚焦现代重要作家作品,反思文学研究的学术路径;重视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尝试建构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密切关注“全媒体”时代的文学写作、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等方面。

聚焦现当代重要作家作品,反思文学研究的学术路径

文学研究与批评始终不能脱离文学本身而独自存在,因此,聚焦现当代文学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家和经典作品,深刻反思当下文学研究的学术路径,成为文学研究界长久以来始终密切关注的重要议题。对于鲁迅、郭沫若、茅盾、沈从文、曹禺、张爱玲、汪曾祺、莫言、王蒙、贾平凹、韩少功、王安忆等现当代重要作家及其代表性作品的经典重读,以及对《应物兄》《人世间》《云中记》《北上》《千万与春住》《月落荒寺》《雾行者》《烟火》等层出不穷的当代文学新作的文本细读,构成了2020年上半年文学理论与学术刊物文章的主要面貌。除却聚焦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中的重要作家作品和青年新作以外,如《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民报》《大同报》《四川公报·娱乐录》《美洲华侨日报》《北京政闻报》《晋察冀画报》等民国及共和国时期重要文学出版物,如日记、书信、佚文、序跋、口述史等与文学现场密切相关的重要史料,以及小说界革命、民族形式论争、左翼文化运动、文艺大众化、抗战文艺、人文精神讨论等现当代文学现象,也始终是文学研究界持续关注的重要主题。

在文章中,学者侧重于对不同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文学语言、叙事技巧、批评立场等诸多面向的讨论和关注。其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专门开设鲁迅作品及文学现象研究、“曹禺110年诞辰纪念”特辑、“沈从文研究”等专栏;《文艺理论与批评》《小说评论》《新文学史料》《中国文学批评》等刊物开辟了关于重读路遥、曹禺、艾芜、汪曾祺等作家的评论及研究专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开辟了关于莫言研究的评论专栏;《扬子江文学评论》则开辟了“名家三棱镜”栏目,先后邀请王德威、骆以军、韩少功、张学昕等海内外学者,对麦家、东西、迟子建等当代作家及其创作进行研究与评谈。

与此同时,2020年上半年的学术刊物也密切关注当代中国青年写作与批评的意义可能与潜在空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文学作品中的青年形象、青年改造问题及五四时期的青年身份等与青年密切相关的议题都成为当代文学研究者们热议的话题。2020年上半年的学术期刊中,出现了对于青年作家及青年批评家的集中关注。《南方文坛》开辟了“青年写作的可能性”论坛,发表何平、杨庆祥、黄平、周恺、李壮等人讨论青年写作的多篇长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开辟“新现象研究”专栏,刊发了从治辰、陈思、张莉等“70后”“80后”学人关于青年写作、青年批评及性别观等方面新现象的研究文章。《扬子江文学评论》还多次刊发关于青年文学形象、新时代青年

写作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在文本之外,文学研究与批评更应该立足于宏大的文学视野。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研究呈现出非常复杂而多变的文学样态。2020年上半年的文学理论与学术刊物,着眼于重新评价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当代中国文学现象,并对文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进行深刻反思。其中,《当代作家评论》以“中国当代文学再评价”为主题,《当代文坛》以“如何书写当代文学史”为主题,《文艺争鸣》以“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为主题进行组稿,丁帆、程光炜、贺桂梅、南帆、赵稀方等学者分别从“历史化”“再解读”“重返80年代”“90年代宏大叙事”等话题入手,尝试对于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重新阐释与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深刻反思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路径,寻找展开同时代人的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的方法。

关注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尝试建构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

在2020年上半年的学术刊物中,关注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等议题,成为一种较为明晰的新趋势。《当代作家评论》专门开辟“国际文学视野专辑”,呈现当代严肃文学及通俗文学的国际传播情况。专栏收录了王玉、刘诗宇、易彬、孙宇、卢茂君等青年学者的文章,从不同角度系统地评价了铁凝、刘震云、莫言等当代作家作品的外文翻译及世界传播情况,并介绍了英国的贺麦晓、日本的千野拓政等海外汉学家的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在《文学评论》《扬子江文学评论》《文艺争鸣》上面,也散见着许多关于阿来在德语国家、彼得·汉德克在中国、《文心雕龙》和王维的诗歌在美国汉学界的译介与形象建构等探讨“世界性”与“中国性”相关问题的文章。海外传播研究主要涉及“世界性”的问题,而“中国性”则主要涉及中国文学的地方路径,以及文学批评、文学写作和文学研究中的“在地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当代文坛》《文艺研究》《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先后发表刘大先、妥佳宁、王欢等青年学者关于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与国家认同方面的文章,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统一与多元的内在辩证,从“地方”与“民族”的视域出发,重新思考“中国”与中国认同的相关问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当代文坛》开辟“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专栏,探讨如何理解“中国性”,又如何认识“地方”与“中国”的关系,“地方路径”怎样能够通达“现代中国”的秘密。

除却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与现代中国的地方路径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世界格局下建立有效的“中国叙事”、建构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等相关问题。《中国文学批评》开辟了“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中国文论走出去”专栏,《文学评论》《学术月刊》《社会科学辑刊》等刊物,也先后刊发了探寻现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相关问题的理论文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学评论》等刊物,也陆续刊发了一系列与生态主义、生态文学及生态美学密切相关的理论文章,尝试从本土自然生态美学的发展中,寻找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新的理论基础。这些学术文章从不同侧面探讨,当下应该如何发现“中国”,又应该如何建立适应中国文学的理论框架和阐释机制。

与此同时,理论研究者也较为关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以及西方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问题。《文学评论》开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专栏”,刊发关于研究两个文艺“讲话”的话语意义、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观念与方法等问题的理论文章;《文艺争鸣》开辟“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研究专辑,对中国文艺理论与政策的谱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初期的理论问题、中国当代文论中的政策话语及批评效应等问题进行思考。围绕这些现当代文论的研究观念与方法问题争论的研究,能够反映出当代文论发展变革的历史进程。理清理论问题的症候与价值基础,能够展现出学者直面现当代文论研究面临的困惑、机遇与挑战的研究姿态,也能够促进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自觉。

“全媒体”时代的文学写作、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

正如学者王汎森所说的,在这样一个举目都是“现在”的时代,想要“创造、保持一个‘距离’,要使人门与‘过去’有联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当下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快速而驳杂的海量资讯扑面而来,新鲜的图像与声光令人目不暇给,纸质媒体逐渐没落,而新媒体日趋崛起。以报纸、期刊等纸质媒体作为物质基础的近现代文学,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文体特征,随着科学技术与信息媒体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生活的深度影响,而出现了新的文学特质与文化新质。日新月异的时代语境为文学写作、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提供了与此前迥然相异的文化场域,逐渐形塑着学生生产的现在和未来。

由此,上半年的部分理论刊物开始着重反思“融媒体”“全媒体”时代的文学,尤其是依靠传统纸质媒体进入历史舞台的精英文学,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所面临的重重机遇、挑战与困境。诸如“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AI”与“文学”“IP化”与“经典化”“数字批评”与“媒体嬗变”“全媒体”“融媒体”时代的文艺转型等问题,成为众多学术理论刊物所关注的新兴议题。

对“全媒体”时代的古代、现代、当代文学以及散文、报告文学、民间文学、网络文学、短视频等不同时段、不同体裁类型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分析,是大部分学者介入这一问题时偏好选择的切入视角。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丁晓原的《论“全媒体”时代的中国报告文学转型》(《文学评论》2020年1期),该文章以报告文学体裁作为研究对象,着眼于“全媒体”时代媒体传播的多样化特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非虚构审美文化对中国报告文学转型的推动作用,以此探寻“全媒体”时代报告文学在公共性与个人性之间达成的新的价值定位。

近几年来,刘慈欣、郝景芳、吴岩、黄鸣奋等科幻文学从业者,以及杨庆祥、谢有顺、张定浩、侯建魁等青年学者,相继在《南方文坛》《中国现代文学丛刊》《当代文坛》《现代中国文学刊》《文学自由谈》等刊物,发表与人工智能时代之下数字人文研究及AI文学写作等议题相关的讨论文章。这一话题在2020年上半年的文学理论刊物仍然具有持续性的生命力,陈建华的《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命运》(《长江文艺评论》,2020年1期)、钱念孙的《“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的自省与自强》(《群言》,2020年1期)等文章,都在延续这一议题。而青年学者秦兰碧的《游戏+时尚:虚拟时尚何以成立》(《文艺研究》2020年3期)一文则另辟蹊径,以从游戏图形标示更换外观的行为中产生的一种文化和产业现象——虚拟时尚为研究对象,从产业模式、结构体系及其与现实世界中的文化关系等面向深入研究,为理解信息时代的虚拟人格、虚拟社会和虚拟经验提供理论可能。

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史,农村题材的小说作品,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如文学史家洪子诚所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位列首位。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乡土文明历史悠久,乡村意识根深蒂固。即便在当下,中国也有相当比例的人口生活在乡村,或者拥有清晰的乡村记忆。新文化运动之后,鲁迅、沈从文等一大批现代作家,在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方面所取得的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成果,为后来小说家的创作积累了开创性的经验,也为新中国成立至今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为时代和社会的一面镜子,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互为镜像关系,这在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更能直观地体现出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及随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我们可以读到同时期诞生的经典小说,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山乡巨变》等等;我们还可以在《平凡的世界》“陈奂生系列”小说中找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包产到户政策推行的蛛丝马迹;在一些当下作家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易地搬迁、乡村治理、精准扶贫政策给乡村生活带来的显著变化。不同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都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貌或者农村社会的中心事件。

新时期以来,社会的多元化趋势,推动了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多元化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社会中心事件的泛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了社会从其共名状态向无名状态过渡,先锋文学的普及,城市文学和类型小说的兴起,都让农村题材小说的绝对优势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何表现乡村,农村题材小说的出路在哪里,对很多作家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韩传喜曾撰文称,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推进,城乡之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传统的乡土意识和乡村文化心理结构也有了较大改变,乡土作为一种静态的农业文明已经走向瓦解,中国逐渐进入后乡土时代。如果还致力于表现近乎原始的、封闭的、落后的乡村镜像,将会使作品严重失真,也无法准确呈现当下农村和农民的现实状态。倘若这样的写作是合理的,那文学将如何印证现实生活?不能印证现实生活,又如何保证作品情感的真实和作家的真诚?作家和作品又将如何得到读者的信任?

炊烟袅袅、鸡犬相闻,这种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乌托邦想象同样令人生疑,这是一种没有现实生活基础、靠想象支撑的写作方式,这种想象全面脱离了当下农村社会的真实状况,在势不可挡的现代化进程中早已丧失了可能性。面对现实,写作者倘若还闭着眼睛,以期桃花源传统的历史性延续,这其实是一种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的缺席。没有乡村生活经验,没有对农民和乡土的关注,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自然无法呈现一幅全新的与现实生活同步的农村社会图景。学者吴晓东批评这种向后追溯反映的恰恰是自我创造力和更新力的薄弱,也是社会观察能力的枯竭。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紧跟时代、贴近农村现实生活、具有当下性和艺术性的小说作品层出不穷,成果可观。虽然当下农村已经没有绝对的中心事件,但各个阶段的热点,都可能被作家捕捉到,成为文学镜像陆续呈现在读者面前。驻村干部面对三代人的恩怨情仇,将如何参与化解矛盾?老藤《遭蛇》的表达显然不仅仅停留在引人入胜的故事表面。进入移民新村后,祖辈相传、浸入骨髓的传统文化与新的村镇生活能否相融共生?潘民的《偷声音的老人们》,将视线投向了易地扶贫搬迁的农民。杨遥的《父亲和我的时代》,则聚焦精准扶贫,让读者看到了大时代背景下,一个农民父亲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

相对于以往的农村题材小说,这类作品呈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面目,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在读者面前,镜像中的乡村社会更加丰富多彩了,作家视角更加多样化了,文本形式也更能体现当下读者的审美需求了。

我们不妨以杨遥《父亲和我的时代》为例,看农村题材小说的新变。今年是脱贫攻坚决胜年,这是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的中心事件。同时,这些年,中国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书写农村新面貌?又如何进入当下农民的内心里?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经验,以及传统的乡土小说的表现形式是否继续有效?读《父亲和我的时代》,也许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可以将《父亲和我的时代》看做是一部家庭伦理和乡村社会伦理题材的小说。作品并没有直接提到国家的扶贫政策,也没有塑造一个扶贫干部,甚至连相关细节都很少出现,作品写的是“父亲”这几年天翻地覆的改变。“父亲”在“母亲”去世后,变得沉默和不修边幅,他的生活是灰暗的,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憧憬。他只希望能有一部收音机打发无聊的时光。从“父亲”找我要一部旧的智能手机开始,他就慢慢发生了变化。他加了“我”的微信,随后又让我在朋友圈转发他种植绿色食品的视频。更让“我”惊讶的是,“父亲”居然做起了微商。“微信、抖音、快手、哔哩哔哩……都是我们的平台”。为了让“父亲”高兴,“我”也成了他的义务推销员,在“我”并没有上心的情况下,“父亲”居然做得有声有色。他还帮助无依无靠的邻居刘桐、前赤脚医生月仙这些乡亲带货。

“父亲”的日子从乌云蔽日到阳光明媚,他的生活质量显著提升,觉得有奔头了,连以前赖以糊口的营生裱匠活,在做微商之余,在“我”请来的纪录片导演的镜头面前,“父亲”也能自豪地将活计做成被人赞赏的手艺甚至传统文化的感觉。“父亲”精神面貌的改变,是从骨子里的,由内到外的。“我”是一个大学毕业后在城里做干部、当作家的知识分子,亲眼见证了“父亲”接受“新生事物”的全过程,此时的“我”开始害怕自己变成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人。“我觉得以前的视野太狭隘了,而父亲他们,我认为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的人们,竟然跟着时代奔跑”。

以前连智能手机都没有用过的乡村裱匠,转变成一个可以发微信,可以直播带货的新式农民,父亲这一意想不到的变化,如果没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契机,没有一个惊人的推动力在他身上施加影响,在逻辑上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杨遥只用只言片语,巧妙地交代了作品的时代背景。这些不经意的碎片化的语言包括“碰上精准扶贫”,“村里第一书记组织培训”,“刚开始做微商时老师就教我们在各种平台上宣传自己”。为数不多的几句话,让父亲的变化变得合情合理、水到渠成。

国家层面的精准扶贫战略正在稳步推进,作品与这一时代背景有着明显的互文关系。我们从小说的标题也可以获得作者的“暗示”。精准扶贫是因,父亲戏剧性的变化是精准扶贫的果。因此,《父亲和我的时代》也是一部精准扶贫题材的小说。

今后的文学创作,即便是重大社会公共事件,或者影响历史进程的农村政策的出台,相关题材的小说,作家的观点下沉,打破宏大叙事模式,转向更贴近生活本身的个人叙事方式,将会成为更加普遍的现象。

在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作家的想象力、小说的叙事呈现出丰富的多样局面,乡村日常生活,社会风俗习惯,人伦关系诸如此类的叙事不断进入读者视野,作家也因此避免了释政策观念的“图解式”路子。比如《父亲和我的时代》,作品的表现方式别具一格,这对今后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多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沃·安德里奇曾说:“在将来,只有那些能够描绘出自己时代,自己的同时代人及其观点的最美好图景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他的这一断言今天仍被很多写作者奉为真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形式还是内容,农村题材小说的呈现方式,也应该因时而变。不把握时代脉搏,作品也就没有生命力;失去了这个根基,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将是空中楼阁,无从谈起。

Advertisement for 'Wen Yi Zheng Ming' magazine, featuring 'West' (西部) section and 'Nanjing Yuan Dong Bookstore' (南京远东书局) new book list.